

中日两国人民图书交流史举隅

于乃义遗著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国，两国的图书交流有悠久的历史。本文仅就晚清即十九世纪末叶我国到日本访书及日本友人与贵州、云南交流图书的友谊简要评述如下：

一

清朝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光绪二年（1876）何如璋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任参赞，我国人开始留心日本的历史与文化，黄氏撰《日本国志》，是近代我国人了解日本开风气的人。随后四年（1880），何如璋约杨守敬到驻日使馆充当随员。

杨守敬，字惺吾，湖北省宜都县人。举人出身，任过教官^①。他到日本，怀想唐宋以来中日两国的图书文化交往，“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②，颇有搜罗散佚之志，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曾以重价购获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一本，甚爱之。但不久即认识森立之，结为朋友。森立之开玩笑地对杨守敬说：“此本系偷抄，其误不少。原本一部在我手，宜校正。”守敬即以《访古志》为线索，“按录索之”。“日游市上，凡版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奋然未献之书^③。因以诸家谱录参互考订，凡有异同及罕见者，皆甄录之。”^④

杨守敬访书，得森立之等人的协助，但守敬更从多方访求，所得出于《访书志》之外者甚多。他这一段紧张而有意义的采访

工作，获得丰收，并非偶然。通过图书的交流，古代日本得之于中国者，又“反馈”给中国。

守敬自述：“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三人，嗜好略与余等。”但他选购古籍，不仅求之于书肆，并遍访藏书家。如“市野光彦、涩江道纯、小岛尚质等，皆储藏之有名者，所得大抵诸家之遗。”他和这些名藏书家打交道，“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见者，彼此交易，于是其国著录之书麇集于篋中。”——以金石拓片换回图书，各出所有，各取所需。

守敬深入考查，发现“日本气候，固无我国江南之多霉烂，亦不如我河北之少蠹蚀。何以唐人之迹存于今者不可胜计？盖其国有力之家，皆有土藏，故虽屡经火灾而不毁。至于抄本，皆用彼国茧纸，坚韧甚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

守敬发现有一些明刻本，日本认为罕见，但中国是通行的，举例如明刘节之刻《艺文类聚》，安国、徐守铭刻《初学记》，马元调刻《元白集》之类，即不收录。但有一些书，日本习见而中土罕遇的，尤其是日本翻刻的旧本和古钞本，以及朝鲜刻本，为“明时丰臣秀吉之役所掠而来，如《姓解》、《草堂诗笺》等书，询之朝鲜使臣并称无传，……求朝鲜逸书者，此地当得其半。”——这些书是守敬访求的重点。

守敬根据所得汉籍古本，查阅“日本古抄本，经注多用虚字。”清阮元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曾怀疑是日本人妄增，“今通观其钞本，乃知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今合校数本，其渐次剷除之迹犹可寻。”说明阮元所见经注本，大抵皆出南宋，致有此误。——这不仅属于经籍校勘，也关乎“虚字”的应用，是我国文字语言学史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稽考。

守敬访书所得，除一般经史子集而外，有两项较多较精的古本：一是医籍，一是佛典。

朝鲜，日本称“中医”为“汉医”。汉医及本草传入日本，唐宋以来，络绎不绝。中土佚失的医籍，在日本还有多种保存着。如隋杨上善《内经太素》、《皇帝明堂》，唐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等，有为“遣唐使人所齎回”者。汉医传到日本，历朝均有发展。守敬得到日本古刻医籍及日本人所著书，如丹波康赖撰《医心方》三十卷，模刊古卷子本，为日本永观二年（相当于北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撰进。此书仿效唐王焘《外台秘要》体裁，所引方书，有不见于隋、唐、宋志，赖此书保存了我国古代失传的医方。又引证的古书如《切韵》、《唐韵》等，皆较早之本，可以校正清代刻本之误。此卷子本书体秀逸，体现了日本古刻本的风格。又森立之辑刻《神农本草经》，经过比对，较之我国的孙星衍、顾观光等人辑本为精，正由于根据日本所藏《千金方》、《医心方》和唐代《新修本草》等古本，显示了日本汉医文献的特点。守敬又得着宋刊寇宗奭《本草衍义》，经森立之介绍，“此书通论药名次第，全与日本现存唐苏敬《新修本草》相符，寇氏发明良多。盖翻性味之说而为气味之论，为金元医家所尊信，本草之学，自此一变。”守敬认为此书“无明刊本，《四库》不得著录，当急为流通者”。——这也是中日图书交流的成果。

关于佛典，从版本角度看，得到大批的宋版《思溪资福藏》五千多卷。当时日本有两部：“一藏近江国营山寺，一藏山城国天安寺。”经中国驻日公使洽购天安寺本，因逾期未交书，公使废约，守敬乃预支薪俸以三千元购回。认为“此书宋刻，中土久无传本，而明刻《南藏》、《北藏》，鲁鱼豕亥，错误甚多，得此以订讹谬，不可谓非鸿宝。”他又见到东京三缘山增上寺收藏高丽刊本《大藏经》六千余卷。并协助黎公使将《高丽藏》里的两部《一切经音义》以西法照出底本待刻，详校我国宋、元、明藏所不载的经目四十余种。又得岛田蕃根协助采获古抄本佛经六、七百卷，“其中有唐人书写者，有日本人传录者，工拙不一，而

时有出于高丽藏、宋藏、元明藏之外。”岛田认为“此皆其国人唐求法僧所携回者”。核其内容，多系唐代密宗的不空、善无畏、金刚智等所译佛经及一行等所撰论，多至一百四十种。日本传中国天台宗及密宗，有“东密”、“台密”两教派，具见于这些译本和仪轨疏注。此后，日本正在编印《新修大藏经》，守敬将这些未收入藏经的文献借供校补。此外，他还得见《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或为古抄本，或为宋刊及日本，高丽刻本，而为中土失传之重要目录学与文字学参考书。保存古佚目录及汉语音义，不应仅视作宗教史料，而是丰富了我国目录学，文字学的文献。

守敬随何如璋使日本，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满载海舶以归。黄州有屋数十间充栋焉”。^⑤

在访书当中，“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原拟回国后与同人进行考证，再撰写提要”，可是杨氏回到黄冈，再任教官，“同好者绝无其人，乃整理字划清晰者录出清本”，这就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光绪丁酉（1897）杨氏邻苏园自刻《日本访书志》十六卷。仅是他访书所得的一小部分。还有“惊人秘笈 尚多未录出者，良以精力衰颓，襄助无人，致斯缺憾”。^⑥直到1919年，杨氏遗书收归故宫图书馆，经王重民清理，又录出守敬在另一部分书中的题识，编为《日本访书志补》，于1930年印行。收录图书四十六种。据孙楷第序称：“杨氏访书遗稿沉霾数十年，至是复得与世人相见，可谓学术界之快事。”但据守敬自序，推测他所载回的书，可能还有若干种连书目都未见公之于世，为王重民补录所未收者。结合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辑工作，收藏单位将会继续整理出来。

杨守敬访书之举，不但嘉惠于我国图书界与文史研究工作者，也扭转了日本的风气。守敬云：“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版尚不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

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籍。……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

《访书志》所收，大部分是中国著述；至于日本著述仅极少数。杨氏拟另编《日本著述提要》，又“根据记载，踪迹采访而始终未见者，拟编《待访录》”。这两种拟编的书，可能未编成。但杨氏本人的著述极为丰富。有关目录学的，除《访书志》及《留真谱》而外，还有《丛书举要》六十卷。有关金石学的著作《隶篇》十册，《望堂金石》初、二集各六册，《筠清馆金文》五册，《小蓬莱金石》五册，《寰宇贞石录》六册，《邻苏园帖》八册，《邻苏园汉印谱》八册，《古泉拓本》十六册，《三续寰宇访碑录》十六册，《日本金石文字》四册编为《观海堂金石丛书》。有关地理学著述《禹贡本义》一卷，《汉书地理志补刊》二卷，《三国郡县表补刊》二卷，《隋书地理志考记》一卷，《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编为《观海堂汇刊》。至于文章杂著，编为《晦明轩稿》。还有《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的编绘^⑦，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对我国地理学贡献甚大。新中国编绘历史地图，以此书为蓝本。——这一系列的成就，大都与他访书日本有关。虽然他的遗著有一部份未出版，但对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尤其是图书学、目录学的影响甚大。距杨氏访书后四十年，日本人岩崎氏以重价购买我国陆心源藏书的大部分，岛田彦顿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还提到和杨氏访书故事相比对，认为“聊足相偿”。我们设想今后当化除畛域之见，不应再存岩崎、岛田的想法，将会有更多的森立之与杨守敬式的人物，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为中日两国图书交流的友谊写出新的一页。

二

十九世纪后期，我国的藏书家与刻书家出现两股热潮：一是

编刻大量丛书，一是对版本之学精益求精，从珍视宋元版上溯到六朝唐五代写本。集此两特点于一身且有国际影响，应推黎庶昌主持得日本友人相助，进行影刻的《古逸丛书》。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他是桐城派后期著名的文人。曾编刻《续古文辞类纂》，为文坛所传诵。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德等国，担任参赞，随又与陈立彬使美。七年（1881）被派往日本接替何如璋任第二届公使。庶昌幼年，已熏染他的家乡前辈郑珍的学风，爱好典籍。抵日本，即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宫岛城一郎等相结识，在东京芝山红叶馆酬酢詠歌，曾刻印他们唱和的诗文《日东文讌集》三编，建立了中日文学的友谊^⑧。

黎庶昌挽留杨守敬继续在日本工作，大力支持守敬采访流传在日本的汉籍。选择所得善本，委托守敬编订，计二十六种，二百卷，在日本请熟练的刻工全部影刊。庶昌自序说：“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经始于壬午（1882）告成于甲申（1884），以其多古本逸编，遂命之曰《古逸丛书》。”

按：影刻善本，早见于清初张士俊译存堂刻印《广韵》、《玉篇》、《佩觿》等五种，而盛于清代中期的孙星衍《岱南阁丛书》、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但这几种影刻，还是国内流传且有其它版本的。至黎刻《古逸丛书》，则是全部影刻，得之日本收藏的隋唐写本与宋元刻本，还有日本古代写刻本以及旧抄卷子本《日本见在书目》，记“从唐代齋来日本之书”。“为部千五百七十九，为卷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分为四十家，七纬不著卷数。又据头衔，盖宽平中（始唐昭宗龙纪元年迄乾宁四年，889—897）佐世在奥所辑，距今九百六十年。”这一卷书目，是我国图书史的重要资料，借以窥见唐代与日本的图书交流。（吴则虞撰《版本系年要录》将此事编列1881年，记为“黎庶昌出使日本，撰有《日本见在目录》”。按此记有误，应更正为黎庶昌得着日本

宽平中编写的《日本见在书目》刻入《古逸丛书》。)

《古逸丛书》，黎庶昌主编，书前有自叙及叙目，就每一种的版本来源作简要考释。但黎氏还是虚心放手给杨守敬审定。每种均刻有守敬跋，也选录了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据守敬在《日本访书志》里提到两件事，表明他们能够合作而又有独立的见解。

一是覆宋本《重修广韵》五卷。守敬云：“余初议刻此书尽从原本，即明知其误亦不改，以明张氏刻书之功过（案：指张士俊刻《泽存堂五种》）；而黎公使必欲从张氏校改。故《古逸丛书》皆守敬一手审定，唯此书及《老子》是黎公使据余校本自为札记，然往往有当疑而径改者……”这说明黎、杨二人各持所见，终之求同存异，两存其说。

二是影宋本《尚书释音》二卷。守敬在《访古记》题记云：“余在日本校刊《古逸丛书》，黎星使女婿张君沆得此影写本（案：黎庶昌叙目记明此书为“武昌张廉卿所藏”），议欲刻之。余谓此书非得之日本，似不必汇入；且此书非陆氏之书，乃宋人之书。星使骇然。余乃检《崇文总目》及《玉海》证之。……”但是此书仍然编入，未采守敬意见。守敬记此一段争议，说明其来历非得之日本，也了解到当时还有黎庶昌的女婿张沆参加工作，他们各抒己见，留待后人评定。

通过考查这部丛书的编刻经过，还可以了解到黎氏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如影宋本《庄子注疏》十卷，唐成玄英撰，为日本新见旂山所藏。黎氏叙目说：“字大如钱，作蝴蝶装，仅存十分之五，予见而悦之，以金币为请，新见氏重是先代手泽不欲售，愿假以西法影照上木而留其真。予又别于肆中收得《养生主》一卷，《德充符》数叶为新见氏所无，并举而归之。”既不夺人所好，而日本友人慨然借予影刊，黎氏又将另外获得的卷帙回赠，这样作风双方都是难能可贵的。

这部《丛书》，黎氏延请名工精细影刻，有的以多种版本配

补，可算是“百衲本”，他自道甘苦说：“极钩心斗角之苦，设异日宋本复出，取以相校，字体多不类，读者当推原其故也。”以后张元济主持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就采取了此种编例。《丛书》刻成，用日本造的“美浓纸”精印，原刻初印本，后人评价认为“几与宋槧元刊等视矣”。^⑨此书问世前六十余年，当宽政、享和年间，日本天瀑山人辑印《佚存丛书》，也是编录汉籍在中土已佚失而见在日本者，计十七种，一百十一卷。印传到我国，阮元选录数种列入《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但天瀑用活字刷印，不如黎氏影刊还可窥见庐山面目。

《古逸丛书》虽在日本刻版，黎氏决定“敛其版运致之官局，以与学者共之。”^⑩黎氏两度出任使日大臣，归国时，带回全部版片交苏州官书局，受到国人重视；印行既久，字多剥蚀。1921年，吴县曹久源作过一次修补，现在流传较广的即此种修补本。

由于黎庶昌开此风气，贵阳人陈矩（衡山）也以所得古籍在贵阳影刻入他所编的《灵峰草堂丛书》。如据唐卷子本影刻的《翰林学士集》等。又德清傅云龙出国考察，于光绪十五年得陈矩赠予《新修本草》三卷，又购得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著录各卷在东京影刻《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补辑一卷，于所编《寰喜庐丛书》之二；又经陈矩等推荐，翻刻题有“延喜十三年（913）刻《文选》残本与“唐天佑二年（905）刻《归去来辞》”。据日本岛田翰说：这两种书是大阪西村某人的贗品。“黄河洪流，夹泥沙而俱下”，是在所不免的，但传刻《新修本草》是我国人第一次翻刻日本保存的唐卷子本，《寰喜庐丛书》也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笃好汉籍建立的友谊。

三

云南与日本相距万里而遥，但早在明朝初年，就有日本诗人逸光古、天祥、机先等定居昆明、大理，留下友谊的诗篇。^⑪方

志记载点苍山还有“日本四僧塔”的古迹^②。

清朝光绪年间，云南派出大批留日学生，还有赴日考查游览的集体或个人。又曾聘请日本专家、学者到云南教课，因而云南人与日本人民建立友谊，其中图书交流也是有意义的。

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一批云南留学生到日本进弘文书院、早稻田大学等校；此后，分期分批继续前往。曾有年岁较高的“老学生”如大理周霞，六十二岁，邓川杨琼，五十七岁，大理李文治、李文源兄弟，昆明钱用中、呈贡秦光玉等均四、五十岁，引起日本的重视。明治天皇曾约见周霞，亲笔写赠“东亚第一老人”。^③杨琼、李文治研究汉字改革，受日本“假名”的启示，撰《形声通》，提出改革方案，在日本印行，传入国内^④。

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云南同乡会编译社”。当时印发的缘起略云：“以开通内地，输导文明为宗旨。同人负此责任，求达目的。军事也，政治也，教育也，实业也。凡此科学，我祖国故乡不于数十年前闢先路，今吸取间接西欧文明于日东岛国，一线光明，望我同人，输入新智识，新思想，鑰通顽固锢习，警醒我桑梓诸青年。……兹设立编译社，纂辑各种教科书，由在东同人分担，采取日本现今各学校应用书籍，编译出版。并博采东西名人著论有关系见闻智识、以购求文明于日东岛国。”^⑤这个编译社，有秦光玉、闵道、席聘臣、张耀曾、钱用中、杨琼、李文治、刘昌明、陈貽恭、杨觐东等人参加，得日本专家教师和出版部门的协助，编成《云南师范丛编》、《师范讲义》三十多种，排版精印，寄回云南供新设的高等、中等学堂作教科书与教师参考书。^⑥

同年秋，袁嘉穀任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到东京、长崎、札幌、江户、足尾各地访问，与日本诗人长冈护美订交，长冈赠以所作的《云海诗钞》，追怀唐贤王维、晁衡故事，使袁嘉穀最受感动的是在日本高等师范见到该校以大名崔述（东壁）的《考信录》作教科书，却是袁的同乡前辈陈履和的刻本，称赞“石屏

文教，远被海外”。袁氏写诗赠日本友人，有句云：“三岛雄峙非偶尔，回首南天云万里；南天能自得师无，归舟访胜昆明湖。”^⑦云南和日本的翰墨缘涌现笔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昆明陈荣昌赴日本考查教育实业，延聘教师。通过湖南范静生的介绍，认识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伯等人，参观了许多大学校、女学校、师范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工厂、农村，此行详记为《乙巳东游日记》^⑧，日本名画家高田忠周赠以画卷，陈氏题赠其画兰绝句云：

“兰为王者香，何事生空谷？住久结灵芝，千秋插芳郁。”

荣昌盛称日本汉学家，缔结芝兰之交，情见乎词。又认识田光渐卿，是俞越（曲园）的好友，他曾旅游四川多年，赠陈氏以所作《栈云峡雨日记》、《春秋左传会笺》等书。访问王子造纸厂，主持人佐伯胜太郎赠以《印刷事业问答》。陈氏遍访许多学校与动物、植物园等，深有感慨地说：“回顾我国故步自封，积重难返；……经书繁重，经义湛深，置之小学不宜，中学亦不宜，徒耗岁月，使人生今世应需之知识技能，反延误而不能完全发达，岂危急存亡之秋所宜尔乎？今不急求普通知识，并施国民教育，而以读经误其岁月，宜外人群起而笑其愚矣。”——陈荣昌曾被认为“清朝遗老”，而辛亥革命前夕，却有这样进步的思想言行，应得自与日本文化图书交流之益。他回国时，带回大量图书仪器，为云南开办新学及筹备修滇蜀铁路之资。

正如毛主席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⑨云南派出的留学生，少数赴英国、法国、比利时，绝大多数赴日本。而且聘请日本教师到云南教课，这也是陈荣昌访日的任务之一。他到日本，通过教育界有声望的长冈护关及弘文书院加田院长等人的推荐，由云南留学生监督钱鸿逵与日方议订合同，聘来农学、工学、理化、博物教习河

合绢吉、池田太郎、茆部一郎、高岛文次郎、迪田容克郎、山口义胜及史学、法政教习江部淳夫、岛田俊雄、加古贞太郎等人，到云南高等学堂及师范、法政、方言、农、工学堂任教。他们曾协助做了一些科学调查、研究工作。如河合绢吉替李坤编《云南温泉志》测定温泉水质^②，山口义胜帮助东川矿业公司进行东川地质的调查^③，江部淳夫研究云南历史，曾向秦光玉借阅清代王崧所编《云南备征志》的原刻本，秦氏即以相赠，由江部复抄一部归还。此后刻印入《云南丛书》的《备征志》，即根据江部的抄本。

1905年7月中国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建立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李根源、赵坤、吕天民等参与发起，并在中山先生的指导下到得日本友人协助编印《滇粹》和明末云南抗清史料和编辑《云南杂志》、《滇话报》。这一些书刊，在日本印刷，寄回云南，为辛亥革命起到推动的作用。《滇话报》是云南人编辑的第一种白话杂志，其文体受日本的影响，以“普及教育，统一言语，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印刷发行，得到东京的友人协助成立“中国留学生印刷所”担任。

昆明人王灿，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认识日本教师古城贞吉，古城赠以所作《中国五千年文学史》，王灿译为汉文，1913年在云南出版。这是日本早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作品，也是国内第一部翻译日本人写的中国文学史，袁嘉毅为此书作序，回忆甲辰乙巳（1904—1905）在长冈护美家会见古城贞吉“代舌以笔，纵横今古”的盛情。王灿有赠别日本来昆明的另外两位教师井田亚忠、高桥义信的诗句云：“南荒不见腾金马，海国遥闻动石鲸，临水登山送君去，离怀共向酒边倾。”又云：“问子行归东国去，太华风景记来无？”惋惜两国邦交发生恶感，而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仍保持友好。

最值得纪念的是清代吴其浚编《植物名实图考》，系近代我

国一部规模大的植物学名著。其中有一部分在云南采获标本，绘图描述，并访得丰富的文献与民间经验作详尽的著录。此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蒙自人陆应穀在山西刻印，传到日本，一再翻刻。并于明治十七年（1884）由八十二岁高龄的植物学者伊藤圭介重新编辑，加入假名的批注，成为日本植物分类学的指导著作，可是《图考》的山西刻本，在中国很难得到，云南姚安人由云龙于光绪年间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时，日本植物学教师矢部吉楨讲课，即引证此书，认为“赅博翔洽，足资参考”。辛亥革命后，由云龙担任云南图书馆馆长，向昭通姜勉之、张仲康征借到明治初年日本《重修植物名实图考》原刻本，由图书馆翻印。这一印本，早于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十余年。此书提供我们研究中国植物文献，尤其是云南产的经济植物、药用植物、观赏植物有丰富的资料。曾经俞德浚、吴征镒征引于《中国植物志》及《云南植物志》。我们校订《滇南本草》也从此书得到参证。这也是中日两国图书交流的一朵友谊之花。

“滇池浩渺接东瀛”，是我们在上年欢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昆明访问演出时题赠清水正夫团长的诗句，借此诗句，也描绘出百年前云南与日本友人文化交流的流风余韵。

-
- ① 杨守敬生平参见《碑传集补》卷末。
 - ② 宋欧阳修《日本刀歌》有“徐福行时经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之句，是宋代人重视中日关系，设想秦代徐福东渡已携去我国古籍《尚书》百篇。
 - ③ 奝然，日本高僧，俗姓藤原。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至中国，带去藏经几千卷及佛像。
 - ④ 见《日本访书志》序及缘起。
 - ⑤ 《中国藏书家考略》第113—115页。
 - ⑥ 见《日本访书志》序。
 - ⑦ 清光绪五年饶敦秩刻本。

- ⑧ 黎庶昌事迹参见任可澄纂《贵州通志·人物志三》及《续遵义府志》。
- ⑨ 《丛书集成初编》丛书百下提要61页。
- ⑩ 《古逸丛书》黎庶昌序。
- ⑪ 明沐昂编入《沧海遗珠》。
- ⑫ 万历《云南通志》卷二31页大理府古迹。
- ⑬ 《云南旅日同乡会报告》乙巳年版。
- ⑭ 解放后有影印本，作为文字改革的参考书。
- ⑮ 《云南旅日同乡会编译社募捐启》1905年铅印本。
- ⑯ 云南图书馆今藏有《云南师范丛编》等书的一部分。
- ⑰ 袁嘉谷：《卧雪堂诗集》卷七。
- ⑱ 《乙巳东游日记》日本排印本及昆明刻本。
- ⑲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横排本，1406—1407页。
- ⑳ 见云南图书馆藏《云南温泉志》稿本，书内附河谷绢吉报告。
- ㉑ 山口义胜：《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

〔**编后记**〕 此文，作者生前投到《云南社会科学》。作者逝世后，本刊又接到此文。由于我们失察，故造成重复发表，希读者谅解。